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新形势下我国周边外交的环境塑造 与人文交流路径探索

许利平 范家麒*

摘 要：2025 年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延续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视周边外交的政策路线，也对塑造周边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形势下，塑造良好周边环境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不断加深，也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中国与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时期的背景息息相关，因此开展周边工作愈加具有紧迫性并应加强主动性。中国对周边环境的塑造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中国与周边国家仍面临身份认知上“近而不亲”、经贸往来存在结构性问题、地区热点问题复杂难解、来自域外国家的压力增大等挑战。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是中国应对上述挑战的重要方式，具体路径包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开展周边人文交流，推动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有机结合，以人文交流打造热点问题的和平叙事，有序吸纳域外国家参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等。未来，中国应秉持长期主义方针对周边环境展开塑造，争取将周边打造成人类

* 许利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范家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生。

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研究”（26ZDA138）（阶段性成果）。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先行示范区。

关键词：周边环境；中国外交；大国博弈；身份认知；人文交流

2025年4月8日至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自2013年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央再次召开有关周边外交工作的会议。在本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①，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②。会议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周边工作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对于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③。本次会议延续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两大重点方向^④的政策脉络，对新形势下塑造周边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同样指出：“深化周边发展融合，强化共同安全，巩固战略互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如何立足于当前国际关系的新形势来理解塑造周边环境的重要性？中国塑造周边环境还面临着哪些挑战？理解这两个问题是中国未来规划周边工作的基础。本文尝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学理性阐释，并对如何以人文交流来推动周边环境塑造的路径进行探索。

一、新形势下塑造周边环境的重要性

当前中国的周边工作面临着什么样的新形势？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重要判断——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⑤。这表明对周边

①②③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2025年4月9日。

④ 有研究者将这一实践特征概括为“两个重点”，参见王俊生：《重塑战略重心：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

⑤ 同①。

环境的研究需要涵盖中国与周边、世界与周边两个分析层次。此外,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对周边环境的塑造将基于国际力量对比而深刻调整,且因与周边关系处于历史高位而具有紧迫性并应加强主动性,这为本文提供了第三个分析层次。本文将依照上述逻辑来对新形势下塑造良好周边环境的重要性展开分析。

(一) 中国与周边联系更趋紧密

与周边的关系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当时的“华夷”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称为周边关系。中国的历朝统治者均重视处理与周边的关系,并逐步发展出朝贡制度作为稳定与周边关系的支撑。早在汉代的典籍中,我们就可以找到外邦之人前来“献见”的记录。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加入朝贡体系的周边国家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华夷”关系还是朝贡制度,都是古代中国在与周边国家互动时自发生成的,总体来看双方交往是和平友好的,中国并不试图干预周边邻国的内政,朝贡贸易也是“厚往而薄来”,以建立中国的声望为主要目的^①。受限于航海技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集中在周边,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天下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周边观”。

然而,近代以来欧洲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对中国的周边环境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不断有周边国家被纳入西方的殖民体系。中国自身也由于未能参与工业革命,与欧洲经济形成“大分流”,在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由于国内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外部局势则因冷战因素的影响而长期紧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与古代时期截然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并非没有试图对原本的周边观念进行调整,例如于20世

①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纪50年代初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理念上超越了传统的等级秩序思想，奠定了当代中国与不同制度国家交往的思想基础^①。

改革开放是中国与周边关系发生改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政府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彼时加强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成为中国对外工作的重点。中国与成立之初的东盟一度处于对峙状态，但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推动了关系改善，双方于1991年开启对话进程，在地区经济和安全方面展开多项合作，并于2010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版。中国与日韩的三边合作虽启动较晚，1999年才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启动了在“东盟+3”框架内的三边合作，但中国与日韩两国的经贸往来早在改革开放后就迅速升温。除此之外，2001年，为了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四国共同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2006年，中国正式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国，这是中国与南亚次区域合作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中国在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南亚四个次区域的周边合作虽然形态与进展不一，但都是中国重新重视周边环境的重要表现。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向大国与周边两大重点方向转向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周边关系中最重要影响因素还是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不管是否有主观意愿，每个大国的发展壮大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变化^②，而对中国的发展壮大感知最深刻的也确实是周边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多数周边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甚至还落后于较早参与“雁行模式”分工的东南亚国家。但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唯一

① 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236页。

② 王俊生：《从朝贡体系到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地区秩序的百年重构》，《云梦学刊》2023年第1期。

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多项尖端科技领先世界。东北亚的日本作为在地区格局中占据传统优势地位的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壮大抱有复杂的心态；而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周边国家则积极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通过产业升级推动本国现代化进程，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也保持着高度关注。中国目前仍在快速发展，上述周边国家对华心态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周边国家在对中国发展壮大感知强烈的同时，还与中国存在全方位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远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联系所能体现的。中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势开阔，历史上存在着众多游牧民族；西南部 and 南部则山脉绵延、河流交汇，各民族通婚现象频繁。据统计，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就有 31 个是跨境民族^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周边国家不仅与中国的边境地区往来更加频繁，甚至与很多内地省份都建立了产业合作关系，双方的人员往来越来越密切。若周边国家出现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或长期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负面影响将有可能传递至中国国内。因此，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并保持周边的繁荣稳定，能够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保障。

（二）世界变局深度牵动周边环境

国际关系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将国家间关系视为结构化的系统，认为一个国家的行为取决于其在结构中的位置^②。从人口来看，尽管中国周边有多个国家的人口突破 1 亿（联合国人口司数据显示印度人口总量已经超过中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大多数周边国家与中国的人口规模不在一个数量级，以中小国家为主。从经济来看，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超过两成和接近两成；而中国

① 王晓玲：《“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人文交流思路的转换》，《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5 期。

② [美]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周边地区经济体量较大的印度和日本,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不超过4%。鉴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当前大国关系演变中的突出现象,大国博弈呈现长期化趋势,因此从结构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周边国家的政策选择均会受到这一格局约束。

世界变局向周边环境的传导也具有强烈的扩散性。2023年,外交部发布《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覆盖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方向的28个国家,每个次区域又包含一个主导能力较强的行为体,分别为日本、东盟、印度和俄罗斯^①。由于上述行为体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也具有对各自次区域内国家施加影响的能力,因此国际变局能够在中国周边实现阶梯式的传播。此外,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在局部的国际事件越来越普遍地拥有全局性的影响力。例如,俄乌冲突属于发生在中国周边之外的事件,但深刻影响了全球政治思潮、大宗商品供应体系和大国博弈局势,进而影响中国周边。2026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事同样对中国的周边环境产生了强烈的外溢影响。

从具体领域来看,世界变局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是政治外交领域。当前各国的政治外交正受到两种潮流的影响,分别为西方保守主义和“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化收益分配失衡催生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回潮,部分国家右翼政治力量影响力上升,全球治理共识遭到冲击^②。而“全球南方”的崛起则是广大南方国家在自身经济实力提升的情况下,针对美西方国家掌控国际规则现状所开展的联合自强行动。上述两种潮流的交汇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周边大部分国家自认为属于“全球南方”国家,并不认可当前西方的保守民粹主义,但不同的国家对“全球南方”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且部分国家对西方仍存在传统路径依赖,尚未在周边地区形成“全球南方”共同

① 参见张洁主编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年度系列图书。

② 李向阳、周琪、丁一凡、张健、田野:《全球右翼浪潮兴起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5年第4期。

崛起的合力。上述两种趋势预计将持续影响周边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决策。

其次是经济领域。当前,世界经济虽显现韧性,但总体仍处于中低速发展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5 年 10 月的预测,全球 2025 年和 2026 年的整体经济增速分别为 3.2% 和 3.1%,其中发达经济体这两年均为 1.6%,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为 4.2% 和 4.0%,相比 2024 年出现下滑^①。而在美国发动全球关税战、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叠加下,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更加凸显。在我国周边地区,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最终消费端高度依赖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更大。此外,制造业的数字化与自动化趋势还会推动发达经济体内部形成生产本地化回流趋势,发展中经济体占据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逐渐萎缩,产业链的价值分配可能更加向上游集中^②,这将给周边国家带来深层次挑战。

最后是社会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推动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当前世界变局的一大特征就是颠覆性技术加速发展,具体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可控核聚变等技术,它们相互之间的融合性高,发展难以预测,能够开辟新的技术应用领域^③。颠覆性技术能够与传统社会各要素结合,进而改变社会样貌。发展是周边国家的共同诉求,无论是先发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还是后发的其他国家,追赶颠覆性技术都是实现发展的重要一环。不过,由于周边国家的发展鸿沟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广泛存在,在追赶颠覆性技术的同时可能会诱发新的数字鸿沟、绿色转型鸿沟和人工智能鸿沟等问题。同时,周边国家

①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lobal Economy in Flux, Prospects Remain Di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14, 2025,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5/10/14/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5>. Accessed March 25, 2026.

② 王玉柱:《数字经济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政策竞赛和规模经济驱动下的分化与整合》,《国际展望》2018 年第 4 期。

③ 余南平:《颠覆性技术与地缘政治视域下的欧洲产业政策回归》,《当代世界》2025 年第 1 期。

的国内情况也普遍较为复杂，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新的冲击。

（三）塑造周边环境具有紧迫性并应增强主动性

对中国来说，周边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依托，当前塑造良好周边环境还具有现实紧迫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形势下部分周边国家对外政策显现出战略焦虑^①倾向。在既往研究中，战略焦虑往往用于分析西方理论框架下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然而近年来这一情况在中国周边国家也开始浮现。例如，日本持续右倾化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地区地位下降的担忧。部分东盟国家则长期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在外部经济压力之下，国内经济决策的利益考量亦趋于短期化。印度具备大国愿景，在国际舞台表现相当积极，意图充当连接西方和“全球南方”的桥梁，但国内发展面临较多困境，恐难以支撑如此宏大的外交战略^②。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选择将阿塞拜疆纳为正式成员，标志着该机制由“五国”格局升级为“六国”格局，也体现了地区国家拓展战略回旋空间的共同意愿^③。中国亟须出台针对性政策，以缓解周边国家战略焦虑情绪。

塑造周边环境的紧迫性还体现在政策的提前规划方面。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与周边国家每一轮关系的提升，都与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准确研判以及对周边政策的及时调整密切相关。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不让人民币贬值，并向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等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赢得了“负责的

① 战略焦虑指的是一国在发展进程中因外在因素改变而产生的不安情绪持续扩大，最终形成主流意识领域的不安全认知焦虑。参见刘建江、刘甲蒙、唐志良：《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缘由、表征及应对思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② 陈小鼎、朱源：《印度“西南大国”的角色塑造与现实困境》，《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11期。

③ 汪金国、樊宇轩：《吸纳阿塞拜疆加入，中亚C5变C6》，《世界知识》2026年第1期。

国家”的称誉，间接推动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①。在如今的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与周边的联系更趋紧密，也就更加需要在政策层面进行提前规划。

除紧迫性之外，中国塑造周边环境的主动性也在增强，这种主动性鲜明地表现在“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这一表述上。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指出，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国家间的互动中产生的，观念上的相近、认知上的相亲有利于塑造友好的国际关系。改革开放前，中国与日本虽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其他方面关系仍面临挑战；中国与韩国关系尚未正常化；东南亚多国亦将共产主义视为安全威胁；南亚地区的印巴关系主导地区格局演变；中亚地区则仍属于苏联版图。即便中国存在改善周边环境的诉求，也不具备相关的局势条件。时过境迁，如今中国已经同多个周边国家达成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形成了命运共同体“集群”，这赋予了中国主动塑造周边环境的有利条件。

在中国与周边关系处于历史高位的形势下，中国也应该更加主动地向周边国家阐释自身的周边政策。王赓武认为，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强盛发展阶段，每一次都对周边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在迎来伟大复兴新阶段，但当前的情况已与此前三次完全不同^②。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中国塑造周边环境的政策手段更加丰富，抓手更多，但政策工具终归需要服务于整体战略目标。中国再次发展壮大，成为周边国家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意识也逐步增强，但不可能退回到古代的“华夷”秩序或朝贡制度^③。新形势下，中

① 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12页。

② Wang Gungwu, "The Fourth Rise of China: Cultural Implicat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2, No. 2, 2004, pp. 311-322.

③ 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237页。

国不仅需要实践中不断明确对周边的战略定位,更需要主动让周边国家了解中国的周边政策,减少因沟通不畅带来的误解。“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尤为重要。

二、中国塑造周边环境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周边工作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仍遭遇到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既源自历史也有现实因素影响,既来自主观也来自客观,既包含内部因素也包含外部因素,既有短期问题也有长期问题,具体可以从身份认知、经贸结构、热点问题和域外压力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身份认知“近而不亲”

亚洲文明古老而多元,在历史的长河中交融互鉴。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儒家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以及各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均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例如,佛教起源于南亚,广泛流行于东亚和南亚地区,与各地的本土文化结合后演化为佛教的不同分支,形成了佛教文化圈。又如,东亚汉字文化圈,其以汉字、儒家文化、东亚佛教、律令制度为基本架构,韩语和日语中均存在大量源自汉语的成语和历史典故,中日韩三国文化亲缘性极强。东南亚的马来文化圈则以马来—印尼语^①为共通语言,伊斯兰教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②。可以说,中国及周边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文明联系。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身份认知存在“近而不亲”的问题,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首先,中国对“周边”的认知不一定得到周边国家的

① 马来语和印尼语同源性超过80%,二者的区别可类比为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区别。

② 许利平等:《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认知差异与路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第291-293页。

认同。“周边”一词的存在需要定语，即谁的“周边”，其中暗含了“中心”的意味。尽管中国并不将自身认定为周边的中心，但这一表述有可能引发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周边秩序构想的疑虑。其次，各国的身份认知较为多元。前述的各个次文化圈为当前周边国家的身份认知提供了基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的身份认知又有了新的内涵与维度。例如，东南亚、南亚和中亚有部分国家属于伊斯兰国家，却在民族、发展阶段、所属地区等方面存在差异。最后，民族主义情绪会影响周边国家的身份认知构建。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对内享有最高权力，对外与其他民族国家一律平等。一旦不同国家对历史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就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冲击各方身份的亲缘性。例如，中日韩三国历史渊源深厚，编写一本共同的历史教材将为中日韩之间的民心相通提供重要基础。然而，由于对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历史问题存在不同的认知，编纂共同历史教科书的工作困难重重。又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地缘矛盾激烈，核心的冲突点就是宗教矛盾。然而，在古代的南亚次大陆，各宗教是共生的，现存的一些清真寺甚至有印度教风格。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分而治之”政策及印巴分治方案，加剧了该地区的教派矛盾，为该地区长期的紧张关系埋下了隐患。

自媒体时代到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认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之下，民众能够更加直接地了解到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这有利于破除社会中既有的一些错误认知。然而，自媒体平台发布的信息往往缺少严格审查，一旦未经核实的信息或带有情绪的言论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潜在的认知矛盾点，就容易引发公众的错误认知。例如，中国和印度同为“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大国，本应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但在数字空间中，误解与误判时有发生。实际上，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且两国之间的文明互鉴源远流长。早在公元399年，中国高僧法显就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归国后撰写了《佛国记》，翔实地记录了天竺社会与佛教发展状况，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诸如此类的文化交流史实未能在两国民众中广泛传播。总之，身份认知“近而不亲”的情况，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民心相通形成了较大阻碍。

（二）经贸往来存在结构性问题

中国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完善，在多个制造业领域拥有比较优势，如今已成为周边产业网络的重要枢纽。不过，中国在与周边国家形成深度经贸往来的同时，也存在产业链层面的竞争。据统计，东盟国家的优势产业大多集中于低技术制造业领域，南亚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则分别承接了来自中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和纺织业转移。中国的产业升级正在进行，与上述国家在部分领域存在一定的优势重合。日韩两国在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中国近年来的技术能力不断提升，未来与日韩的产业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①，但合作仍将是主流。在全球经济上行周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风险还较为可控。但当全球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且美国对华贸易制裁不断延展之际，部分周边国家就会受到影响，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也会升温。随着全球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不断发展，围绕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日趋激烈，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还可能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的结构性问题还有着更深层的影响因素，即国际发展知识的长期滞后。从沃尔特·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到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再到东亚“雁行模式”的长期实践，这些理论和实践均强调追赶式的发展。这些国际发展知识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等基础部门的发展需求。对于中国及周边国家来说，由于低端制造业带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各国为了维护国内就业市场的稳定，在承接低端制造业方面的竞争格外激烈，导致经贸

^① 沈铭辉、张中元：《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新进展与应对策略》，《国际贸易》2023年第9期；刘娅、梁明、徐斯、齐冠钧：《中国制造业外迁现状与应对策略——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性的分析》，《国际贸易》2023年第5期。

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部门同样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却在既往的国际发展知识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①。中国周边国家物产丰富,农业生产禀赋良好,但农业生产并不发达,部分国家甚至面临粮食危机。“城市贫民窟”现象在多个周边发展中国家出现,农业人口试图在城市寻找制造业工作,发现岗位供给减少、待遇下降,但又因为农村就业机会不足而只能继续留在城市。这种情况加大了各国政府面临的压力,它们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外资的优惠力度,形成竞相优惠的局面。可见,如何更新国际发展知识并进行再实践,已然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深层次挑战。

(三) 地区热点问题复杂难解

和平稳定是中国周边国家的民心所向,但地区热点问题频发。东北亚地区的朝核问题、东南亚地区的南海问题及部分双边领土争议、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中亚地区的边界冲突问题等,虽尚不足以引发全球性的战乱,但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性强,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大。与前文提及的经贸往来结构性问题不同,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往往根植于历史。朝鲜半岛、南亚与中亚地区的热点问题明显带有冷战时期大国博弈的历史痕迹,各国的边界争端往往要追溯到殖民政府瓜分地盘时私相授受的秘密协定。当前的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对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国之间的互动模式,这使得地区热点问题相当难解。

中国向来秉持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不选边站队的立场,主张构建冲突双方互信,并积极向冲突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处理自身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时,中国强调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议,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中

^① 谢来辉:《“一带一路”框架下农业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23年第9期。

国的政策总体上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对地区热点问题影响力的提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已经取得了全方位进展,为地区稳定提供了建设性支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始终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原则,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此外,随着中资企业海外布局的持续拓展,中国在海外拥有广泛的利益,在热点地区同样如此。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与促进地区稳定之间保持平衡,是对中国周边外交智慧的重要考验。

地区热点不仅会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影响地区秩序构建的方式来间接影响中国的周边环境。与欧洲地区以超国家一体化为主的地区秩序构建方式不同,亚洲地区国家由于内部差异等原因更加倾向于使用软性约束的方式践行地区主义,这种软性约束的重要前提就是地区国家的团结。因此,地区热点问题有关各方的矛盾一旦未被妥善管控,就会外溢至其他地区。目前,东北亚地区由历史认知引发的热点问题已经多次阻碍中日韩三方合作,当前的柬泰双边摩擦是否会外溢至澜湄合作等多边框架还有待观察。可见,无论是从双边还是多边层面来看,如何处理地区热点问题都将是塑造周边环境必须面对的考验。

(四) 来自域外国家的压力增大

上文提及的身份认知、经贸结构和热点问题更多是周边地区的内部问题,而外部因素对中国塑造周边环境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其中大国关系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自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均重视保持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影响力。依据西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有学者将美国界定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该理论认为此类大国天然存在遏制新兴发展力量的战略倾向。中国致力于实现和平发展,坚决反对走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老路。维护周边地区的稳定,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而美国对这一点拥有清晰的认知,因

此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周边国家展开拉拢。除美国外,欧洲多国、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对参与中国周边事务的兴趣也在不断提升。上述国家虽非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但多从现有国际秩序中受益,时常主动配合美国推进排他性地缘布局。另外,部分周边国家也确实存在对中国发展壮大 的担忧心理,对中国的战略存在误解,不愿区域秩序形成单一主导力量,对域外国家参与地区事务持包容态度,这进一步增大了中国塑造周边环境的外部阻力。

当前,美国主要以“小多边”的模式来搭建各类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小多边”国际制度关注的议题并不固定,成员的选择也更加灵活,且属于行政权力范畴,大多数合作事项不需要各国立法机关的批准。域外大国借助“小多边”国际制度的特点,在很难拉拢到全部周边国家的情况下,积极与部分重点国家开展合作。日本与韩国是美国多个“小多边”机制的重要成员。美国也看重印度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于2017年提出所谓“印太战略”,并重新启动肇始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救灾合作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目前该机制已经具备一定的实体化运作基础,所涉及的议题延伸到了投资、基建、关键技术、海事、人文和卫生等领域^①。小马科斯上台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转向,美日菲三边合作迅速升温并向机制化发展,合作议题不局限于安全,也延伸到了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成为域外国家干涉南海问题的重要工具^②。整体来看,域外国家在中国周边的“小多边”合作具有针对性强、与既有机制联动性强、议题拓展性高等特点,其地缘影响力向区域内辐射,将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构建带来持续挑战。

① 刘鹏、张硯思捷:《“四方安全对话”扩大化与实体化及其对东盟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25年第1期。

② 韦宗友:《同盟关系下美日菲三边关系走向及影响》,《当代世界》2024年第11期。

三、塑造周边环境的人文交流路径

如何应对塑造周边环境面临的多重挑战,是学术界与政策界关注的议题。既往文献对此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大多关注物质层面行动,对以人文交流为核心的非物质性实践路径关注不足,理论与实践深度有待挖掘^①。中国外交部2023年发布的《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将人文列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四大支柱之一、六大聚焦领域之一^②。人文交流内涵丰富、外延广阔,包括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媒体、旅游等领域交流及青年群体交流^③。人文交流能够循序渐进地促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情感接近、价值理念融通,是物质交往的补充,能为周边环境塑造提供充沛的内生动力。以人文交流塑造周边环境,需要对人文交流的定位进行精准的把握,发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资源丰厚的优势,从而对中国的周边环境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

(一) 以亚洲价值观为引领开展周边人文交流

如前所述,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身份认知相近但亲缘性不强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史中,值得各国民众铭记的友好交往的历史要远远多于冲突的历史。不管是在各个次文化圈之内还是之间,中国与周边国家民众在诸多价值观理念和处世哲学上都具有相通之处,只是各国的叙事构建存在细微不同。然而,周边历史交往的现实表明,在历史上占少数的冲突与矛盾最终成为认知隔阂的重要来源。这说明周边认知共同体较难自发形成,中国应当通过人文交流主动精准施策,推动构建和而不同的认知共同体。

① 许利平:《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②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5日第6版。

③ 许利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路径与机制》,《新视野》2014年第5期。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中国开展周边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和平是开展人文交流的基本要求。尽管冲突与战争不是中国与周边交往的历史主流，但必须铭记历史，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没有和平，人文交流将无从谈起；而合作是开展人文交流的重要途径。人文交流作为非物质性交流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其超越了单纯的利益交换，以集体主义为导向，旨在实现共同进步。开放是开展人文交流的必然要求。人文交流不只是形式上的开放，更需要心理层面的开放。历史证明，开放才能进步，封闭造成落后。尤其对于中国来说，故步自封的封闭心态曾是近代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而在立足国情基础上借鉴他人长处之后又再次走向复兴。因此我们应当从内心深处欣赏并尊重对方的文化，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和谐共生。包容是开展人文交流的价值准则。在人文交流活动中，一些观点、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上的不同在所难免。包容指的是始终将“他者”视为自我完善的镜像而非威胁^①。中国与周边国家都应在人文交流中秉持谦和包容的心态，减少对方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

对中国来说，以亚洲价值观为引导开展周边人文交流，需要加强对负面评价的抵御能力。在当前的国际舆论场中，西方国家掌握着话语权优势，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体存在偏见，而周边国家大部分民众当前对中国的了解仍然以西方主流媒体为主要渠道，这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不利。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应增强抵御负面舆论冲击的能力，看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整体向好的大趋势，理性回应境外公众人物的片面对华评价，客观沟通化解认知分歧，避免简单对立、全盘否定的处置思路^②。

① 刘卿：《“亚洲价值观”的深刻内涵、理论超越与实践创新》，《人民论坛》2025年第20期。

② 许利平：《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二）推动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有机结合

从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我国在同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时，不能仅仅关注物质收益。日本企业20世纪在东南亚投资初期，由于过于看重商业利益而一度受到当地社会诟病。韩国与越南的关系建构则是将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有机结合的正面案例。韩越两国于1992年建交后，越南很快成为韩国开展贸易投资的重点合作对象。在合作过程中，韩国重视软实力的构建，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其流行文化在越南拥有很大的影响力。韩国的制造业部门不仅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也为人文交流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它们还积极邀请文化界人士和明星为企业产品代言。如今，在韩国本土的文化活动中，越南民众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①。目前，中资企业在海外开展投资时，也越来越重视推广中国的本土文化，但两者之间的结合尚不紧密。经贸活动与人文交流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减少由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矛盾。

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活动的经贸潜力同样值得挖掘。以人文交流中的体育交流为例，体育产业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有重要贡献，其市场化体系完善，转播技术成熟，娱乐化程度高，相关赛事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受众，中国及周边地区同样是西方体育产业的重要消费市场。近年来，中国的“村超”等民间体育赛事发展迅速，已经吸引了很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运动员参加。在其他一些人文交流活动方面，中国与周边民众在书画作品、歌舞艺术，以及网文、网剧、网游等数字文化“新三样”等领域同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兴趣，市场化发展拥有充足动力。未来，中国应积极推动本国民众参与在周边地区举办的人文交流活动，并为活动的市场化发展提供更多便利。

① 裴春梅、祝凡：《公共外交视角下韩越经济合作研究》，《当代韩国》2019年第1期。

（三）以人文交流打造热点问题的和平叙事

中国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频发，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国与国之间的全面对抗。以南海问题为例，南海是沿岸人民相互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周边地区经贸往来的基础。2025年7月，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东亚合作年度系列外长会时表示，南海应该构建起新叙事，不要一提到南海就想到摩擦、冲突甚至对抗，而是应想到和平、稳定与合作，这应成为今后南海叙事的主流^①。中印边界争端是两国关系的症结，但争议地区附近的两国民众仍有亲缘和教缘关系。柬泰冲突涉及的柏威夏寺等宗教遗迹，同样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恢复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叙事，将有助于周边团结，防范域外势力对地区内部事务的干涉。

人文交流作为低政治议题，敏感度不高，能够激起双方民众共同的美好情感，应以此为抓手打造热点问题的和平叙事。例如，南海沿岸地区的妈祖庙和清真寺等在建筑风格方面相似，见证了南海的和平，对这些文化遗迹的追溯将重塑沿岸人民的历史记忆。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冈仁波齐峰和玛旁雍措湖被印度多种宗教信众尊为圣地，但中印边境问题曾对两国宗教交流造成一定影响。2025年，中国宣布恢复印度香客赴西藏的朝圣活动，在两国社会引发热烈反响，为增进相互理解和缓解边境地区紧张态势提供了积极示范。此外，媒体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提升责任感，不应以追求点击量为目标，而是要积极参与和平叙事的构建。相关领域的学界人士可积极向社会公众传播专业知识，防止民族主义情绪主导舆论。各科研单位可考虑将人文交流的社会影响力纳入科研考核中，以提升专业研究者参与和平叙事构建的积极性。

^① 《王毅：和平、稳定与合作应成为南海叙事的主流》，央视新闻客户端，2025年7月12日。

（四）有序吸纳域外国家参与中国与周边人文交流

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中应秉持开放的原则，这不仅仅是指向周边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向域外地区的开放。周边国家光辉灿烂的文明本就包含了与域外交流的硕果。伊斯兰文明发源于阿拉伯半岛，通过陆海两路传入中国及周边地区。西方基督教文明伴随殖民活动进入周边地区，给当地民众带来深重苦难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部分技术与制度的传播，如今周边地区的基督教信徒也占有一定比重。当前，西方国家总体而言仍然在科学技术等方面拥有相对优势，对我国周边国家的人文影响深远，将其排除在周边人文交流之外并不现实。

对于域外国家参与周边人文交流活动，我国应秉持有序吸纳的原则。一方面，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是中国与多数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共识基础。中国与多数周边国家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联合自强的决心坚定，共同主张改革现有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环节。在上述主题的人文交流活动中，如何对域外国家的参与进行定位具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鉴于当前大国竞争的国际环境，部分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壮大存在战略疑虑，并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尽管美西方国家中存在一定数量对华以及对周边友好人士，但推动该类国家参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活动仍存在一定挑战。中国可选择教育、体育和旅游等人文交流领域，多吸纳域外国家参与小范围试点，为未来更长远的东西方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提供依据。

四、结语

周边环境的塑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文交流在其中发挥着桥梁和润滑剂的作用。我们应当认识到，周边环境的塑造进程应呈波浪式前进

态势，即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率先取得成果，以此为基础逐步拓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发展同样将是呈螺旋态势前进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周边人文交流既有可能在一些方面取得快速进步，也有可能随着情况的变动而面临暂时的困局，但科技进步与时代发展将给人文交流带来新的变化。对此，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充分认识到塑造周边环境的重要性，秉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策略开展相关工作，不断塑造对我国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

中国塑造周边环境的远景目标应当是将周边打造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示范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了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而提出的理念，现已成为指导中国对外政策实践的重要方针^①。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水平高，相互了解不断加深，同时面临诸多共同的挑战，这为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机遇。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还具有可延展性。例如，当前东盟国家和中亚国家都在尝试以开放的姿态提升自主性，2025年首届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在吉隆坡召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区域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由周边向外拓展的过程中，人文交流同样将发挥重要的非物质性作用，为各方合作的推进提供民心相通的基础。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人民出版社，2023。

Environment Shaping and Pathways for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in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A Study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XU Liping FAN Jiaqi

Abstract: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shaping a sound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for China is of growing importance. This importance stems not only from the deepening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but also from profound shif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context that China's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have reached their best level in modern history. Hence, neighborhood-related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rgent and calls for greater proactivity.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shaping its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yet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lose yet not intimate" identity perception, structural problems in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complex and intractable regional hotspots, and mounting pressure from extra-regional powers. Strengthen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Specific pathways include conduct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guided by the Asian values featuring peace,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promo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with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us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to create a peaceful narrative on hotspot issues, and orderly engaging extra-regional countries in China'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with

its neighbors.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uphold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shaping its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striving to build the neighborhood into a pioneering pilot zone for advancing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China's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China's Diplomacy; Great-Power Competition; Identity Percepti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本文编辑：曹 钺)